

清季哈爾濱防疫領導權爭執之背景*

杜麗紅**

摘 要

1910年10月，哈爾濱發現鼠疫。面對疫情，哈爾濱的中俄地方當局最初合作防疫，後因理念不同，分道揚鑣。俄方試圖干涉道外防疫，中方堅決抵制，雙方展開交涉，並將道裡道外隔離開來。隨著疫情惡化，清政府外交壓力增加，外務部派來了以伍連德為首的醫官隊伍，到哈指導防疫事務。最初，他們受哈爾濱地方官和防疫會的抵制，難以發揮應有作用。在各國使團壓力下，經過外務部與東北地方交涉後，伍連德指導防疫的權力得到東北地方官的認可，但與防疫有關的交涉權力仍歸地方官所有。此後，伍連德得到了各方的政治支持，防疫得以順利進行。哈爾濱防疫領導權之爭，實質上是一場交織著各種矛盾的複雜政治過程，既不能簡單地概括為主權之爭，或中西醫學之爭，也不能僅僅視為外交壓力或外務部干涉的結果，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哈爾濱、防疫領導權、伍連德、中俄交涉

* 本文曾作為會議論文，提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二屆青年學術討論會，承蒙與會學者同仁的批評指正；全文修改過程中，蒙曾業英、岳秀坤、周祖文、黃國信、高瑩瑩等先生指正；審查時，復得匿名審查人的許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2年1月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10月4日。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前 言

在宣統朝爆發的東北鼠疫期間，哈爾濱不僅是疫情最嚴重的城市，而且是整個東北防疫的指導中心。從某種程度來講，這種指導地位源自以伍連德為首的醫官隊伍在哈爾濱所取得的領導防疫的權力。目前，具有西醫背景的中國醫官是如何取得防疫領導地位的記述，僅見於伍連德的自傳。¹該書從當事人的角度，提供了醫官和地方官爭執的第一手資料，但其侷限性亦相當明顯。筆者認為，鼠疫伊始，圍繞哈爾濱防疫領導權的爭執就已開啓，歷經中俄主權之爭、紳醫之爭和官醫之爭，以伍連德為首的醫官才取得指導防疫事務的權力。時任東三省總督錫良與中央及地方的往來電文檔和哈爾濱地方報紙，²為我們提供了全面瞭解上述爭執背景的寶貴材料。本文將利用上述兩種資料，輔以伍連德自傳，儘可能地再現哈爾濱防疫領導權爭執的複雜歷史過程，凸顯不同政治力量在如何防疫問題上的角力。

本文希望能為已有相當學術成果的東北鼠疫研究提供如下新的視角：首先，已有研究多選取防疫整體過程的某些面向進行討論，³這種將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內容抽離出來的研究，可能會忽略掉歷史本身的特質，即它是特定時空內多重因素和矛盾交織的結果。本文試圖通過還原哈爾濱這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的防疫領導權爭執的具體過程，剖析蘊含其中的中西醫學、中俄主權、官紳

¹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1959).

² 清季，哈爾濱報業發達，不僅有多種俄文報紙，如哈爾濱市自治公議會主辦的《市議會公報》，東清鐵路管理局創辦的《哈爾濱日報》，俄國東方學者協會機關報《亞細亞日報》等，而且還有中文報紙，如周浩主辦的《東陞公報》，以及本文引用的哈爾濱第一家中文報紙《遠東報》。目前，筆者僅能見到《遠東報》。該報由東清鐵路局創辦於1906年3月14日，華俄道勝銀行每年撥款5萬元資助，它代表了在哈俄方的聲音，對華人防疫持批評態度。由於資料的缺失，較難看到當時哈爾濱本地華人的聲音，只能透過《遠東報》的文字，瞭解一二。這勢必影響文章論證的客觀性。對此，筆者在論述中，將儘可能地結合其他資料，力求貼切地加以分析。

³ 胡成討論了主權之爭對整個防疫的影響。參見胡成，〈東北地區肺鼠疫蔓延期間的主權之爭（1910.11-1911.4）〉，《中國社會歷史評論》，期3（2008年7月），頁214-232。焦潤明集中討論了朝廷所採取的措施。參見焦潤明，〈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及朝廷應對措施〉，《近代史研究》，期3（2006年5月），頁106-124。

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進而增進我們對歷史過程複雜性的理解。其次，已有研究討論了俄、日、美、英各國圍繞防疫問題的外交角力，強調外交壓力對清政府的影響，⁴而未能顧及地方層面的中外交涉，以及外交壓力是如何作用於地方，忽略了清政府的政治運作，也忽略了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的矛盾和鬥爭。本文試圖揭示出中俄雙方的地方交涉升級為中央交涉的原因，以及外務部將外交壓力付諸東北地方具體交涉的實施過程。第三，已有研究彰顯東北防疫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以及醫學界人士的作用，⁵但未能揭示他們是如何進入政治體系取得領導地位的。本文將描述中央任命的醫官領導防疫事務權力的獲得，並非一紙命令所能達成，而是在歷經複雜的政治爭奪過程後方才實現，而且各種防疫措施必須得到權力機構的配合，方可付諸實施。綜上幾點，筆者認為哈爾濱防疫領導權之爭，實質上是一場交織著各種矛盾的複雜政治過程，既不能簡單地概括為主權之爭，或中西醫學之爭，也不能僅僅視為外交壓力或外務部干涉的結果，而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清末哈爾濱的行政區劃及二元管理模式

1890年前後，傅家甸附近開始形成居民點，僅有兩、三百戶。直到1898

⁴ 早在1967年，美國學者卡爾·納珊(Carl F. Nathan)就從滿洲政治格局角度，討論了東北地區鼠疫防治與地區政治鬥爭的關係。參見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7)。1992年，王學良利用美國檔案，闡述了各國政治勢力在這場鼠疫防治中的角力。參見王學良，〈1910年東北發生鼠疫時中美與日俄間的政治鬥爭〉，《社會科學戰線》，期3（1992年5月），頁216-222。

⁵ 1980、1990年代，海外學者描述了東北鼠疫爆發流行過程，以及從中所體現出來的中國現代性問題。近年來，因應醫學社會史研究的熱潮，學者們重新關注東北鼠疫，從醫學史角度深入剖析疫情防治的具體狀況。請參見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 China* 14: 2 (April 1988), pp. 107-155；費克光，〈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收入劉翠溶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下冊，頁673-739；Mark Gama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 *Past and Present*, Vol. 190 (Feb. 2006), pp. 147-184；Sean Hsiang-lin Lei, “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 Constituting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n Plague (1910-11),”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3-108.

年，田家燒鍋周圍僅兩百多戶人家，秦家崗仍是一片荒野，埠頭本是低窪的江灘，人煙稀少。⁶1903年7月14日，東清鐵路全線開通，哈爾濱正好位於這條全長2,489公里的「丁」字形鐵路的中心。1906年，該鐵路先後與烏蘇里江鐵路和國際鐵路聯運，哈爾濱成爲了東北北部的商貿中心，北連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南接旅順、大連、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西通歐洲。歐洲商品由此輸入到中國，大豆、小麥和麵粉亦由此輸往歐亞各地。1907年8月，清政府在哈爾濱設立海關，但直至1909年才正式運作。1910年，其進出口貿易額達4,787,200元。⁷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哈爾濱人口激增，1911年初約有12萬餘人，⁸俄人和華人的比例約爲3:7。⁹就像當時中國新興的商貿城市一樣，哈爾濱也是二元管理模式並存，由俄人管理的「道裡」和清政府設治的「道外」兩部份構成。中俄雙方在各自管轄範圍內履行特定的管轄權，彼此互不干涉，遇事多採用交涉的方式。¹⁰

東清鐵路管理局依據《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第六款的規定，¹¹以鐵路用地之名，先後三次在哈爾濱擴占土地，共拓地約130平方公里，形成了俄國管轄的鐵路用地。¹²俄國人力圖在東清鐵路用地內建立像租界一樣的制度，「以

⁶ 薛連舉，《哈爾濱人口變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頁49。

⁷ 〈滿洲之關稅〉，《遠東報》，1911年8月24日，附張之二。

⁸ 1911年，哈爾濱地方官估計「道外有業無業人民，均四萬有奇」。參見郭司使自哈爾濱來電，1911年1月1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以下簡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1912年，鐵路附屬地有華人67,647人，俄人43,091人。參見石方、劉爽、高凌著，《哈爾濱俄僑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頁52。根據前述資料計算，哈爾濱人口數約爲15萬左右。伍連德自傳中記載道裡道外共計124,000人。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17. 這兩個數據差距較大，筆者在此採取較少的說法，即人口數爲12餘萬人。

⁹ 此比例按照俄人43,091人，華人107,647人計算得出。

¹⁰ 中國從未承認過俄國在東清鐵路公司用地上的行政管理權，這種權力是被俄國所攫奪的。但在日常管理中，中俄雙方基本認可各自的權力範圍。

¹¹ 「凡該公司建造、經理、防護鐵路所必需之地，又於鐵路附近開採沙土、石塊、石灰等項所需之地，若係官地，由中國政府給與，不納地價；若係民地，按照時價，或一次繳清，或按年向地主納租，由該公司自行籌款付給」。步平、郭蘊深等編著，《東北國際約章匯釋（1689-1919年）》（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136。

¹² 哈爾濱市地方誌編撰委員會，《哈爾濱市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卷4，頁57-58。

鐵路督辦為代表的東清鐵路公司是鐵路租借地內的全權主人，而中國人被認為是外國客人，應完全服從主人的要求。」¹³

1904年11月，東清鐵路公司設立了地畝處兼理民政，排斥中國政府參與鐵路用地內的行政管理。1907年7月，東清鐵路管理局民政處正式成立，專職負責該公司鐵路用地的民政事務。與此同時，俄國人開始採取居民自治的形式，淡化鐵路公司的角色，進而將鐵路用地管理殖民地化，將中國排斥在外。1907年1月17日，東清鐵路公司批准《哈爾濱自治公議會章程草案》。11月17日，俄國財政總顧問希鮑夫和東清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召集120名俄商，在道裡商務俱樂部開會，通過該草案。次年3月11日，哈爾濱自治公議會正式成立。該公議會雖是東清鐵路用地的市政管理機構，但所有重要決議都必須經東清鐵路公司認可，方得執行，實質上不過是東清鐵路公司行使權力的代表機構。正如俄外阿莫爾軍區司令瑪律蒂諾夫所言，自治會雖然成立了，但「中東鐵路管理局是名符其實的具有政府所固有的全部職能的殖民政府」。¹⁴哈爾濱自治公議會直接管轄的範圍包括道裡和南崗一帶，合計約7.8平方公里，通稱道裡。東清鐵路管理局將該區域內的市政管理、商業事務、城市設施、園林綠化、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務，移交自治公議會董事會管理。¹⁵中方堅決反對俄方擅設哈爾濱自治公議會，多次進行交涉。¹⁶雙方於1909年5月10日簽訂《東省鐵路公議會大綱》，書面上承認中國主權不容損失的原則，但並未改變俄方在鐵路用地內操作自治公議會、排擠中國的事實。

1899年，應東清鐵路管理局的要求，清政府先後設立了黑龍江鐵路交涉局和吉林鐵路交涉局，局址設在哈爾濱，專管鐵路界內交涉事件。隨著俄在私佔鐵路用地上建立自治管理機構，僅僅依靠鐵路交涉，已不能解決中俄之間的

¹³ B. 阿瓦林著，北京對外貿易學院俄語教研室譯，《帝國主義在滿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145。

¹⁴ 薛銜天，《中東鐵路護路軍與東北邊疆政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頁156。

¹⁵ 石方、劉爽、高凌著，《哈爾濱俄僑史》，頁162、168-169。

¹⁶ 王學良，〈美俄在「哈爾濱自治公議會」問題上的勾結與爭奪〉，《北方文物》，期2（1985年7月），頁79-83。

問題，故而清政府將交涉局實地化，設立了道一級行政建制。1905年10月，清政府批准在傅家店設立濱江關道。1906年，濱江關道成立，由吉林鐵路交涉局總辦兼任濱江關道道員，其他人員分別由吉林、黑龍江鐵路交涉局各出5名。1909年6月21日，清政府批准東三省總督錫良、吉林巡撫陳昭常所請，將濱江關道改為西北路道，仍駐哈爾濱，巡防吉林西北一帶地方，兼管哈爾濱關稅及商埠交涉事宜。1910年，吉林西北路分巡兵道是中國政府在東清鐵路附屬地週邊設立的最高權力機構，其長官為道台，由吉林鐵路交涉局總辦兼任。¹⁷濱江關道由鐵路交涉局總辦兼任，彰顯了哈爾濱交涉事務的重要性。

濱江關道下設了次級行政單位，管理具體事務。1907年2月6日，正式設立濱江關江防同知，專理華洋交涉及哈爾濱鐵路界內的命盜案件，其所轄地不足十里，未得到俄國承認。1907年4月18日，第一任濱江江防同知朱啓經到任。1910年5月23日，濱江江防同知改為濱江廳，管轄道外、太平各一部份和香坊東部地區。¹⁸鼠疫爆發時，清政府設立的西北路道和濱江廳管轄有傅家甸¹⁹和四家子，通稱道外，本文亦將中國人管轄區域統稱為道外。中方的管理機構尚屬草創，傅家甸、四家子兩處共計約4萬人口，僅有馬步官長士兵230名，「衛生、消防各隊，均已開辦，並無預巡可編，探防尚屬整飭」。²⁰道外雖有道、廳建制，但無足夠的行政力量負責日常管理。新設立的地方性組織，如濱江商會、自治會和議事會，²¹是官府管理道外依靠的重要力量。

¹⁷ 有關哈爾濱濱江關道設治始末，請參見以下兩文：申國政，〈關道設置簡要始末〉，《黑龍江檔案》，期1（2006年1月），頁52-53；李朋，〈吉黑兩省鐵路交涉局的「嬗變」——1898-1917年中東鐵路附屬地行政管理權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期1（2010年1月），頁22-35。

¹⁸ 柳成棟，〈哈爾濱設治始末〉，《學理論》，期6（2005年2月），頁58。

¹⁹ 1908年，何厚琦就任江防同知時，「以店字義狹改為甸字，此傅家甸所由來也」。〈哈爾濱四十年回顧史〉，《濱江日報》，1939年1月5日，第5版。

²⁰ 鄭可使自哈爾濱來電，1910年12月4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往來電〉，冊17，甲374-15。

²¹ 1908年，哈爾濱道外濱江公益會改為濱江商務分會，1909年成立了哈爾濱商務總會，入會商家有654家。參見《黑龍江省志·商業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頁558。清末憲政改革推行，各級地方選舉議事會，濱江議事會應運而生。1910年11月5日，舉行正副議長選舉。12月11日，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濱江議事會正式成立。參見〈選舉正副議長揭曉矣〉，《遠東報》，1910年11月5日，第2版；〈議事會開會〉，《遠東報》，1910年12

雖然中方將鐵路交涉局歸併到濱江關道，但未得到俄方承認，它仍將其視作在兩國條約框架下交涉處理鐵路界內事務的機構。因此，在防疫過程中，俄方仍以鐵路公司為主體，由東清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²²與中方關道兼鐵路交涉局總辦于駟興²³進行交涉。此外，哈爾濱地理位置特殊，對於涉及雙方的各項事務，中俄雙方都非常敏感。中方官紳深諳俄方的霸道行徑，異常警惕其藉口干預道裡事務侵佔中國主權和領土。

二、鼠疫來襲之初道裡道外的合作防疫

1910年10月26日，哈爾濱發現第一例鼠疫患者。不久，《遠東報》發表文章，說明鼠疫並非天災，而是一種由鼠類傳播的「微生物流毒」，只需注意清潔衛生和滅鼠即可。因該報特殊的背景，姑且將其視為俄方對防疫的基本判斷。

預先防備的方法也不甚難，但要人人注意衛生，各人家中總須掃刷得乾乾淨淨，臥室及廚房兩處尤宜留意，最好灑以石灰粉或辟瘟藥水。屋內窗戶要時常打開，通進空氣及日光，以免潮濕。衣服與臥具等也要每日曬晾一次。至如鼠族及蚤蟲、臭蟲各物，必須設法捕殺之，勿令其暗中傳佈百斯篤。如遇皮膚上有些破裂，急須用藥療治，而且身體不好過勞。劇場啦、酒店啦，人數眾多，也不宜時常出入。慎起居，節飲食，勤沐浴，不時更換衣服。百斯篤病原雖狠，到此地位也就不能傳染過來。即或傳染過來，有一病人即須與之隔絕，或送入醫院，

月10日，第2版。

²² 狄米特里·列奧尼德維奇·霍爾瓦特，1903年7月東清鐵路正式通車後，被任命為東清鐵路管理局局長，直至1920年被趕下臺。

²³ 于駟興，字振甫，安徽壽縣人，1905年入趙爾巽幕府，善文章，精通內務、政典和刑律，深得趙信任。1909年6月，任東三省蒙務局總辦，11月，調任黑龍江鐵路局交涉總辦。1910年8月1日，以「留奉天補用道」身分署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備道，兼濱江關道、吉林鐵路交涉局總辦和鐵路稅捐局總辦。

如此則直接的傳染病亦可銷除。²⁴

爲因應鼠疫的威脅，東清鐵路管理局和哈爾濱自治公議會在道裡積極採取措施，查驗病患、注意清潔以及滅鼠。11月8日，哈爾濱自治公議會董事會邀集各醫院及醫生商議防疫之策，決定將哈爾濱分爲八區，每區派正醫生1名，副醫生2人，衛生局役4人，隨時調查報告有無染病者。爲此，董事會撥款5,000盧布，預備一切應用之物。²⁵同時，籌建驗病所，聘請醫士、看護士數十名。²⁶10日，東清鐵路公司組織防疫隊，設正醫生1員，副醫生4員，衛生局役12人。此外，置買運屍車1具、運送疑似病者車12具，以及運送染疫者車4具，並在哈爾濱各處設立防疫所。²⁷

巡警當局還發布告諭，要求商行、客棧等在兩星期內一律收拾淨潔，遇有與瘟疫可疑之人，立即呈報。若有違背，將令其出資清理並嚴懲。對於因病死亡者，必須由醫士查明到底是何病症，因何致死。董事會會員馮雲翔以華人多不解衛生之道及瘟疫傳染的危險爲由，要求將瘟疫現象及傳染之利害譯成華文，印成傳單，發給華人，使其知瘟疫之害及預防之策。²⁸

此外，哈爾濱防疫衛生局投入鉅資購買了若干防疫器具，包括花12,000多盧布購買用熱空氣清除裡外衣物中的微生物的器具，以11,500盧布購買撒藥水的器具，²⁹以及很多消毒藥劑和滅鼠毒藥。³⁰爲了方便通訊和聯繫，哈埠防疫急救會由交通不便的秦家崗移往江沿繁盛之區，並在防疫急救會、防疫總所、秦家崗醫院和調驗所分別安設電話。³¹

在採取上述措施的同時，俄方與道外地方官聯繫，要求合作防疫。11月

²⁴ 〈說防疫〉，《遠東報》，1910年11月12日，第1版。

²⁵ 〈董事會議設防疫局〉，《遠東報》，1910年11月10日，第2版。

²⁶ 〈董事會招取醫生設立驗病所〉，《遠東報》，1910年11月12日，第2版。

²⁷ 〈鐵路防疫情形〉，《遠東報》，1910年11月11日，第1版。

²⁸ 〈巡警局長條陳防疫辦法〉，《遠東報》，1910年11月15日，第2版。

²⁹ 〈購買排除微生物之器具〉，《遠東報》，1910年11月17日，第2版。

³⁰ 〈防疫時所購之藥料〉，《遠東報》，1910年11月20日，第2版；〈衛生局殺鼠有藥〉，《遠東報》，1910年11月20日，第2版。

³¹ 〈防疫分所電話與總所相接〉，《遠東報》，1910年11月20日，第2版。

10 日，鐵路公司照會中國地方官，要求派俄醫到傅家甸查驗，發現接近疫病患者的人都送交醫院治療。³²中國地方官員對俄方交涉做出積極回應，成立防疫機構，頒布防疫章程，並聘請俄醫協助防疫。

14 日，于駟興會同俄員及濱江廳巡警局警務長、自治會、商務會和三江閩粵會館等各界人士，成立了濱江防疫會。³³該會由濱江廳章魯泉司馬擔任正會長，電報局吳椒甫為副會長。防疫會議定的防疫辦法有三：一是附設防疫事務所一處，辦理相關事務；一是租賃樓房 25 間作為養病院，治療患疫者；三是派衛生醫士赴各區挨戶查驗，遇有患疫者送往養病院醫治。³⁴該會是個鬆散的機構，每日會議一次，到會者有地方官、俄醫士，以及商會、學界和報界人士。其形式不過是大家議論一番各自想法，並設法辦理。³⁵該會成立後，與道裡衛生局議定，兩局代辦彼此參預兩局事宜。³⁶

傅家甸地方官將防疫事務放在首位，暫停辦理一切公牘，每日到防疫會商議辦法，隨時調查患病之人。³⁷于駟興對於防疫事務不可謂不用心，不僅資助防疫會，而且安裝電話。他告知傅家甸官商各界，「果有善法防疫，雖需用鉅款，可向管道衙門請領，以期防疫之得力」。³⁸11 月 17 日，于駟興派員送交濱江商會 1,000 盧布，購備藥品。³⁹24 日，又送交該會俄洋 2,000 元，購買藥品。⁴⁰28 日，他「以防疫會距道裡頗遠，不時有詢問之件往返，殊為不便」，⁴¹在防疫會、消毒所、養病院、疑似病院以及巡警局暨四分局，都安設了電話。⁴²

防疫會成立後，主要從清潔、查驗和捕鼠三方面辦理防疫事務。該會認為

³² 〈俄員擬派醫士在道外驗病〉，《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1 日，第 2 版。

³³ 〈傅家甸防疫之計畫〉，《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³⁴ 〈傅家甸防疫詳志〉，《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

³⁵ 〈傅家甸城裡衛生局近聞〉，《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

³⁶ 〈傅家甸衛生局近聞〉，《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7 日，第 2 版。

³⁷ 〈地方官防疫之殷〉，《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9 日，第 2 版。

³⁸ 〈于關道之注意防疫〉，《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27 日，第 2 版。

³⁹ 〈預防瘟疫經費有著〉，《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

⁴⁰ 〈于觀察注重防疫辦法〉，《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25 日，第 2 版。

⁴¹ 〈關道飭防疫會安設電話〉，《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29 日，第 2 版。

⁴² 〈巡警局因防疫均安設電話〉，《遠東報》，1911 年 1 月 2 日，第 2 版。

防疫最基本辦法是注意清潔，在頒布的《濱江廳防疫之示諭》中，提出了民生防疫的三要素，即「不衣汙穢之衣，不食腐敗之食，不住潮濕齷齪之地方」。⁴³爲此，該會派人調查汙穢地方，飭令該處居民清理，並由自治會委派殷實商民，每日稽察各自管轄的院落是否淨潔，並隨時告知住戶防疫辦法。⁴⁴可商民積習難改，不過略掃穢土，院內不存髒水而已，各客棧、飯館等並未改善多少。⁴⁵

防疫會還聘請了俄醫，每日攜同防疫會調查員和員警查驗各處，將各區病斃者每日呈報濱江道、廳各署一次。⁴⁶防疫會的調查人員分別由商界、學界、自治會和三江會館派員擔任，⁴⁷他們既不懂防疫知識，亦不願聽從俄醫指導，其成效可想而知。

老鼠被認爲是鼠疫之源，捕鼠成爲防疫的重要手段。傅家甸居民喜睡土坑，幾乎家家都有老鼠。醫士議定由捕鼠入手，由巡警局傳諭各家一律搜捕，並令暫停燒火坑，以防傳染。⁴⁸更有甚者，防疫會命令停止殺豬一星期。⁴⁹

道外防疫與道裡防疫的組織形式和方法十分相似，此時俄國輿論較爲認可傅家甸的防疫，對防疫抱樂觀之態度。他們認爲，傅家甸官廳及自治會留意防疫，不僅通飭商民一律遵守衛生章程，俄員亦願協助，而且「組織衛生局十分完全，如巡警局、自治會中外各醫士，以及道裡衛生局代表等皆參預其事」，因此「傅家甸不致盛行瘟疫」。⁵⁰這種樂觀的態度，也與人們認爲天氣寒冷瘟疫將自滅的想法有關。⁵¹從死亡人數來看，截至 27 日，道外因疫死亡 17 人，

⁴³ 嬰，〈濱江廳防疫章程書後〉，《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⁴⁴ 〈傅家甸防疫之周詳〉，《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25 日，第 2 版。

⁴⁵ 〈傅家甸防疫之狀況〉，《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23 日，第 2 版。

⁴⁶ 〈傅家甸病疫者之報告〉，《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7 日，第 2 版。

⁴⁷ 〈關於防疫之會議〉，《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⁴⁸ 〈華人防疫之入手辦法〉，《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⁴⁹ 〈傅家甸爲防疫斷屠〉，《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29 日，第 2 版。

⁵⁰ 〈預防瘟疫之要〉，《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24 日，第 1 版；〈濱江防疫之效力〉，《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21 日，第 2 版。

⁵¹ 此論常見於報刊，如「近日，又降大雪，天氣較寒，咸望瘟疫可從此消滅，將不至爲患」。參見〈喜雪〉，《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又如「刻下天氣亦寒，將來諒不至於爲患矣」。參見〈濱江防疫之效力〉，《遠東報》，1910 年 11 月 21 日，第 2 版。

多由滿洲里而來，各區住戶並未發現疫情。⁵²

雖然輿論對傅家甸防疫持樂觀的態度，認為瘟疫之氣可以掃除，但未得到俄醫的認可，這也是中俄雙方分道揚鑣的起因。21日，道外防疫所代辦俄醫卜得白爾哥⁵³指出，道外防疫未盡得法：雖規定每日派專人調查疫情，但僅有10人接受調驗，各街巷都沒有設法防疫；地方官未令富商等購取各種防疫藥料；防疫醫院的廁所汙穢異常，病人出入不知預防，監獄的病人也送至該醫院，與染瘟者同臥於病床之上；調驗所也未預備妥當。⁵⁴

作為一名受過西方正規醫學教育的醫生，卜大夫對防疫會的批評，促使筆者重新審視防疫會前述各種措施，意識到那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模仿。基於對鼠疫的不同認識，防疫會骨子裡不願意、也無力真正仿照俄人辦法防疫。事後，于駟興在總結辦疫經驗時亦承認，雖有章程，卻未嚴格執行，「此間調查、消毒、檢驗諸法，早經照章實行，惟小民安於自便，檢查太嚴，輒相反對。紳商亦每稱不便，辦事員遂不免因此顧慮。職道督率無力，深為忱愧。」⁵⁵例如，某小店內發現一具死屍，醫生前往查驗，確係染疫身死，但該店內與其同臥一炕的華人20餘名，仍若無其事到各處作工。⁵⁶面對道外官民對瘟疫的無動於衷，卜大夫深感防疫一事十分棘手，決意不再參預道外防疫事宜，請求道裡將其撤回。⁵⁷對此，官方以中西文化差異為說辭，解釋其去職原因在於：「防疫醫院聘任的俄國醫生以彼此風俗習慣不同，致與商民滋事生齟齬」。⁵⁸

哈爾濱在剛剛發現鼠疫的時候，中俄地方管理機構都做出了正面的回應，

⁵² 〈傅家甸並無瘟疫發生〉，《遠東報》，1910年11月27日，第2版。

⁵³ 即 Roger Budberg-Boenninghausen (1867-1926)，其妻是中國人，自學漢語，是傅家甸唯一的俄國醫生。Mark Gama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00-1911," *Past and Present*, Vol. 190, pp. 150-151.

⁵⁴ 〈卜醫生言傅家甸之防疫辦法〉，《遠東報》，1910年11月21日，第2版。

⁵⁵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0年12月3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8，甲374-15。

⁵⁶ 〈傅家甸防疫之不易著手〉，《遠東報》，1910年11月25日，第2版。

⁵⁷ 〈卜大夫不干預傅家甸防疫事〉，《遠東報》，1910年11月27日，第2版。

⁵⁸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0年12月2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7，甲374-15。

除了建立防疫機構，撥發防疫經費，聘請防疫人員之外，雙方甚至進行合作。但是，由於中西醫學對防疫的不同理解，相似的防疫措施卻有著不同的內涵，從而導致中俄在防疫事務上的合作破裂，形成對峙的狀態。

三、交涉與隔離：抵制俄人染指防疫領導權

11月23日，道外所聘俄醫卜大夫辭職，中俄在防疫事務上的合作中斷。俄方著手交涉，意圖干涉道外防疫事務，由此引發了雙方的衝突。基於不同防疫理念和方法，且摻合著強烈的民族情感，這種衝突表現為：俄方試圖干涉中方防疫，要求用俄醫，要求隔離；由地方紳商控制的防疫會認為中醫足以防疫，拒絕嚴苛的西法，為維護主權拒絕俄醫，為經濟利益拒絕隔離。

卜大夫離開後，俄方輿論轉而開始批評華人防疫，要求俄方干涉防疫事務。俄文報紙指出：「傅家甸商民向不知衛生之要，沿街任意拋棄穢物，室內亦不知掃除淨潔，是以最易傳染瘟疫」，「華人有染瘟疫者並不報明，雖有染瘟疫而死者，亦多半棄之街市，從未聞醫士能由某房內起出因病倒斃之屍身。」⁵⁹進而宣稱，如果傅家甸防疫不力，俄人將會干涉防疫事務，「恐哈埠傳染瘟疫，擬派兵隊駐紮本埠過道一帶」，若華人不設法預防，「傅家甸必有外國衛生醫士前往查驗」。⁶⁰

俄人為強迫道外採取西法防疫，因而加緊交涉。他們宣稱，「西人對於此症非常注意，且素有歷練，一切防疫辦法無不研究心得，文明社會亦皆承認，從未有聞反對西法防疫者也。」⁶¹以此為由，他們要求中國地方官辦理道外防疫

⁵⁹ 〈俄報之論防疫也如此〉，《遠東報》，1910年11月27日，第1版。

⁶⁰ 〈預防瘟疫之要〉，《遠東報》，1910年11月24日，第1版。

⁶¹ 〈續論防疫之關係〉，《遠東報》，1910年12月1日，第1版。其實，西歐各國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就已放棄隔離和傳染病醫院這樣的防疫措施，僅通行於亞非殖民地而已。Mark Gama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00-1911," *Past and Present*, Vol. 190, p. 166.

時，「辦法不可不嚴密，多捐經費，聘醫生，用西法防疫，中俄合辦此事」。⁶²他們特別要求聘請俄醫防疫。因為中國醫士醫術不精，不知預防疫症傳染，更不解西法防疫之善。雖然內地有通達中西醫術的名醫，但在哈埠並無通泰西醫術的中國醫士，若由他埠聘請，未免多費時日，致使疫情不可收拾。⁶³

25日，霍爾瓦特前往道外，與西北路道于駟興面商防疫事務。于駟興表示將保證防疫需款無虞，願意禁止道內外人員的往來，但聘請洋醫之事應由防疫會酌辦。⁶⁴次日，霍爾瓦特邀請于駟興前往鐵路公司會商防疫問題，要求「傅家甸防疫會一切規模，皆照道裡辦理，否則必須設法隔離，以免時疫之傳染。」⁶⁵同日，鐵路公司代辦達聶爾照會吉林鐵路交涉局防疫辦法 8 條，包括多用洋醫、多設檢疫所等項。⁶⁶于駟興拒絕接受俄人干涉防疫事務，表示「俄人禁道內外往來一語已成口頭禪，若派俄醫、俄警越界查驗，則我何能承認？」⁶⁷他同意籌鉅款組織醫院數處，但反對聘用俄醫查驗。⁶⁸對於斷絕道內外交通一事，因「與商務、交通大有妨礙」，影響甚大，沒有答應。⁶⁹東清鐵路公司及駐哈俄國領事前後照會七道，要求參與道外防疫事務，于駟興俱以言論自由駁覆。⁷⁰此舉雖耽誤了疫情的防治，卻保證了後來中國得以獨立辦理防疫。

此時，民間紛傳俄人將調重兵圍守傅家甸，並攤派醫士協同俄警赴傅家甸查驗。在隨即召開的防疫會會議上，自治、商務兩會人員表示傅家甸是中國內地，中國自有行政權，毋容俄人干預。⁷¹防疫會堅決反對俄醫前往驗疫，並稟

⁶² 〈三論防疫之關係〉，《遠東報》，1910年12月2日，第1版。

⁶³ 〈續論防疫之關係〉，《遠東報》，1910年12月1日，第1版。

⁶⁴ 〈中俄官場之會議防疫〉，《遠東報》，1910年11月27日，第2版。

⁶⁵ 〈俄報條陳防疫之言〉，《遠東報》，1910年11月27日，第2版。

⁶⁶ 〈防疫會特開會議原因〉，《遠東報》，1910年11月27日，第2版。

⁶⁷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0年11月2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7，甲374-15。

⁶⁸ 〈關道會議防疫之近聞〉，《遠東報》，1910年11月29日，第2版。

⁶⁹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0年11月2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7，甲374-15。

⁷⁰ 〈東陞公報被封之悲憤錄（續）〉，《申報》，1911年4月4日，第2張第3版。

⁷¹ 〈自治、商務兩會為防疫之爭執〉，《遠東報》，1910年11月27日，第2版。

請于道，「傅家甸防疫自有主權，毋容西醫干預，至斷絕道裡道外交通一說，無足輕重，惟欲干涉華人防疫之事，決不承認。」⁷²以防疫會為代表的紳商勢力，強力維護中國主權，堅決反對俄人干涉中國內政，甚至不惜斷絕道內外交通來阻止俄方的干涉。

華人報紙《東陞公報》⁷³不斷發表文章，表示「堅意反對取用西法防疫，並拒絕俄人商辦防疫問題」。⁷⁴他們主張，「中國人有病用中國醫生醫治，此為社會習慣，勿須俄醫干預」。⁷⁵俄人亦深知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瀰漫，在中方拒絕俄方干涉防疫的要求後，俄方並未採取過激措施，而是將道裡和道外隔離開來，彼此實行不同的防疫手段。

中俄雙方對鼠疫有著不同的認識和判斷。中醫認為鼠疫並非不可治癒，或服藥，或針灸，而俄醫則認為無法醫治，只能採取防疫辦法，阻止其傳播。⁷⁶傅家甸紳商認可施針之說，認為患者經剃髮匠施針就可治癒。⁷⁷報紙介紹了施針治療的方式，即「以針刺其兩肋或按血管刺之出血可癒，有出紫血者，有出黑血者，若無血則難治矣。醫學家研究此症係氣血過行，總在使其血氣流通，即可治癒。」⁷⁸12月5日，濱江防疫會會長稟請濱江關道，「電請精於針法醫士來哈襄理防疫」。⁷⁹紳商藉此大力提倡中醫研究。傅家甸議事會以「中醫與西醫比較隔閡之處甚多，即防疫法亦諸多隔閡」為由，設立了醫學研究所一處、衛生醫院一處，研究中醫。⁸⁰這種施針療疫方式被接受現代醫學的俄人視為非常可笑，《遠東報》編輯對此評論道，「姑無論此等剃髮匠本未受有醫學之教

⁷² 〈傅家甸商民之有自治力〉，《遠東報》，1910年11月29日，第2版。

⁷³ 該報由周浩創辦，抵制《遠東報》立場堅決，被沙俄視作眼中釘，後因「登載俄兵邊事多不確實」被查禁。參見《黑龍江省志·報刊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頁27。

⁷⁴ 〈華俄人員會議防疫問題〉，《遠東報》，1911年1月12日，第1版。

⁷⁵ 〈三論防疫之關係〉，《遠東報》，1910年12月2日，第1版。

⁷⁶ 鄭司使自哈爾濱來電，1910年12月4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7，檔號甲374-15。

⁷⁷ 〈敬告部派、督派防疫專責者〉，《遠東報》，1911年1月4日，第1版。

⁷⁸ 〈染疫者之病狀〉，《遠東報》，1910年12月5日，第2版。

⁷⁹ 〈電調醫士來哈防疫〉，《遠東報》，1910年12月6日，第2版。

⁸⁰ 〈傅家甸將設醫學研究所〉，《遠東報》，1910年12月15日，第2版。

育，又未有醫家之考驗，不能勝如此防疫之重任，即令有一二獲生者，亦可謂之倖免而究不能使剃髮匠貪天功也。」⁸¹

傅家甸防疫會由商會、自治會主持，雖通過章程，在形式上採取了西法辦理防疫，但防疫措施並未真正落實。防疫會沿襲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將疫症視為天意，將俄方強制防疫視為無理干涉，反對隔離、圈驗、消毒和燒毀等措施。例如，傅家甸大有店城有一人患疫，賓州官吏封閉其居室，而商會、自治會堅決為之啓封，最後導致復居是室者又死四五人。⁸²當時，鼠疫的死亡率幾近百分之百，很多病人進入醫院後，再也未出來，人們「寧可死在室內，也不願送入醫院，更認為無病之人一入病院即登鬼錄」。⁸³這種狀況促使中國人更加抵制採用俄人防疫措施。在俄人看來，防疫會藉口西法防疫不符合中國人的習慣，「不特不加以研究之功，輔助盡行之方法，而竟有首先作梗者，梗之不已」。⁸⁴

道裡防疫的嚴苛措施引發了華人的恐慌，有關瘟疫的謠傳不勝枚舉，受到中俄雙方的高度關注。有傳言說，「哈埠界內俄人如查有華人受疫者，無論已死與否，即於掩埋，或帶赴防疫局，食以毒物」。⁸⁵此傳言驚動了吉林巡撫陳昭常，為此他致電于道，詢問傳聞是否屬實。于道回電告知，「鐵路公司會同職道設法籌防，均經身親其事，亦無掩埋病人、食以毒物情事，確係謠傳」。⁸⁶另有謠傳謂，「各醫士已受鐵路公司賄賂，故遇有傳染疫症者，即予以藥水服之立斃」。《遠東報》非常重視該謠言可能引起的危害，指出「此等無稽之談固然毫無價值，不值一論。然在愚民一面，誤信此事實為防疫前途之大障害，必致以生命與防疫者抵抗，尤可危者，或因捕風捉影之談釀成暴動之患。」⁸⁷

由於中俄雙方在防疫事務上的分歧難以彌合，中方拒絕俄方要求，俄方開

⁸¹ 〈敬告部派、督派防疫專責者〉，《遠東報》，1911年1月4日，第1版。

⁸² 〈敬告部派、督派防疫專責者〉，《遠東報》，1911年1月4日，第1版。

⁸³ 〈公私醫院之並立〉，《遠東報》，1911年1月5日，第1版。

⁸⁴ 〈半開通黨之誤事〉，《遠東報》，1911年1月4日，第1版。

⁸⁵ 〈浮言之宜禁〉，《遠東報》，1910年12月17日，第2版。

⁸⁶ 〈關於謠言之申飭〉，《遠東報》，1910年12月17日，第2版。

⁸⁷ 〈注意謠傳之奇異〉，《遠東報》，1911年1月5日，第1版。

始採取措施，強制隔離道裡道外的交通。11月27日，俄報發表文章，要求斷絕與傅家甸的往來：

為今之計，俄人不能瞻前顧後，因噎廢食，必須自行設法防疫，以救社會之危險。固然華人為滿洲之主人翁，且向來保護自己權力，每恐他人侵奪，而今置瘟疫於不顧者何耶？今也俄人所當注意者，果能如何設法，始可禁止瘟疫不致傳染，況華人亦未必真不解瘟疫之危險以及傳染之敏捷。然則有保民之責者，不得不注意禁絕瘟疫問題，尤不可拘守成格，貽誤大局，故不得再事因循，亦勢有不能求全者也。今之最要問題，必須與傅家甸斷絕往來，庶可預防於萬一。⁸⁸

12月2日晨，俄商界各代表商議隔離道裡道外。華商代表指出，傅家甸商民不認可西法防疫，故俄員提出的防疫辦法不能照辦。晚間，在貿易公所續議此問題，一派認為隔離傅家甸與道裡商務經濟關係不大，傅家甸不過轉運糧貨及各種貨品，與哈爾濱生計無足輕重，若能隔離，可免傳染滿洲各處。以麵粉公司為代表的一派，則認為若隔離傅家甸，與糧商大有影響，反對隔離。出口貨物麵粉等多由傅家甸商人包辦，或定合同，割交定資，亦間有供給米糧，由傅家甸繞行，與經濟和交通上有最大危險。此外，工人、大車亦多由傅家甸而來，難以禁止糧台的各商營業。最後，糧商們不得不服從多數，同意隔離傅家甸。為了保證市面不受影響，華人仍可以出入糧台，不過需隨時接受查驗，且華人不能由糧台進入道裡，由俄人送至道外，再由華人接收。⁸⁹為解決隔離之後日常生活品的供應，董事會決定從西伯利亞轉運食用肉，青菜則由哈埠附近供給。⁹⁰5日，董事會議定隔離道裡道外，規定「凡往來者，須由醫士驗明，發給執據放行，否則概行禁止」⁹¹。道外的華人只許到糧台，如欲前往傅家甸，或由傅家甸至道裡，必須持有查驗特別證明。⁹²

⁸⁸ 〈俄報之論防疫也如此〉，《遠東報》，1910年11月27日，第1版。

⁸⁹ 〈俄商界關於隔離問題之會議〉，《遠東報》，1910年12月9日，第2版。

⁹⁰ 〈俄商會議防疫問題如此〉，《遠東報》，1910年12月2日，第2版。

⁹¹ 〈實行隔離之主義〉，《遠東報》，1910年12月6日，第2版。

⁹² 〈道裡道外之不交通〉，《遠東報》，1910年12月6日，第2版。

濱江防疫會對隔離並無異議，但對由此給華商帶來的經濟損害表示關注。隔離當日，傅家甸官商各界商議俄人組織由他處運貨問題，以免有損華商利益。⁹³此外，似無其他應對措施。自十月發現鼠疫後，「凡進街糧車以及外埠客商均聞裹足」，哈爾濱的商業已經大為蕭條了。⁹⁴這種商業停頓的狀況也許正是防疫會能夠嚴詞拒絕俄方干涉道外防疫的重要原因。道外居民受此影響較大，他們中有很多人在道裡學堂、秦家崗銀行以及鐵路公司任事，隔離消息傳出後，均擬遷至道裡居住。⁹⁵

隔離後，道裡防疫仍秉承其對鼠疫的理解，⁹⁶加強了施種鼠疫疫苗和滅鼠。俄國人意識到，通過地方交涉難以促使中國人採用西法防疫，遂經由俄駐華大使直接與清廷外務部交涉，威脅出兵干涉，要求哈爾濱地方改進防疫。12月9日，錫良致電外務部表示傅家甸防疫事辦理妥當，道台已經撥給款項，創設了防疫會、養病院、檢疫所，訂定了會報，延聘了醫員以及購制了藥品。⁹⁷同日，外務部回電告知俄使的回函內容，「中國地方官於該處防疫事，並不注意，致哈埠各人民頗有危險，且有傳染加盛之勢。尚無敷用之醫士及防疫各藥料，暨未定有應用防疫辦法。」俄使要求外務部電飭地方官，速與鐵路公司商定防疫章程，並威脅道：「如中國地方固執已是，本國應自行設法辦理，並先隔斷傅家甸道內行人往來。」外務部據此要求錫良撥專款，令濱江關道訂立自辦章程，妥速開辦，以免藉口干涉。⁹⁸對此，錫良似未予理會。

除通過中央交涉施壓哈爾濱地方外，俄方未採取其他強硬手段。隔離後，道裡道外仍在防疫事務上有所往來。12月中旬，濱江防疫會邀請道裡防疫衛

⁹³ 〈傅家甸會議隔離問題〉，《遠東報》，1910年12月6日，第2版。

⁹⁴ 〈商業因時疫蕭條〉，《遠東報》，1911年1月13日，第2版。

⁹⁵ 〈道外居民擬實行遷移〉，《遠東報》，1910年12月18日，第2版。

⁹⁶ 俄國醫學界認為東北鼠疫是腺鼠疫，經由鼠類傳播。此時，俄國已研製出了鼠疫疫苗，並已在印度試用，故非常重視在哈推行施種疫苗。

⁹⁷ 致外務部電，1910年12月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3，甲374-46。

⁹⁸ 外務部來電，1910年12月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3，甲374-46。

生局代表醫士到會商議防疫辦法。俄醫提出，應按日稽查中國客棧、酒館、娼寮、監獄及習藝所等場所，督促清理淤穢，才能達到防疫效果。防疫會表示同意此建議，擬每日派會員帶巡警分赴各處查看。⁹⁹

爲了維護中國人管理中國地方的權力，爲了維護中國人應對瘟疫的習慣，道外的中國地方當局和防疫會抵制了俄國人對防疫領導權的干涉，卻未能抵制住鼠疫蔓延。在道裡道外的交涉和隔離過程中，傅家甸防疫形勢日益惡化，死於瘟疫者日多，21日已有二十多名，¹⁰⁰12月底每日斃命者更達四、五十人之多。¹⁰¹哈爾濱疫情的日盛促使各國駐京外交官緊急與外務部交涉，施加壓力，指出中國地方當局辦理防疫不力，應立即加以改善，否則將出兵干涉。¹⁰²這種外力的推動改變了哈爾濱防疫的僵局。

四、變革防疫機構：醫官防疫指導權的獲得

道外雖然仿建了俄式防疫組織，卻缺乏接受過西方醫學教育的醫生的參與。據地方官估計，當時傅家甸和四道子地區有華人4萬餘人，卻無一懂西方醫學的中國醫士，結果病人無人檢驗、染病地方無人消毒以及疫死屍身無人掩埋，這些都大大加劇了瘟疫的流行。¹⁰³爲緩解缺醫的狀況，清政府從外地派來了醫生和防疫人員。他們到哈伊始，沒有得到地方官和防疫會的認可，雙方矛盾重重，未能發揮出應有作用。在中央外務部的強力支持下，經由吉林巡撫的直接干預，醫生們才取得了指導防疫的權力。

雖然濱江防疫會相信中醫足以辦理防疫事務，但地方官更願意任用學習西方醫學的醫生。在拒絕俄方派醫提議後，于駟興認識到「中醫實乏良士，俄醫

⁹⁹ 〈兩防疫會之聯合〉，《遠東報》，1910年12月15日，第2版。

¹⁰⁰ 〈傅家甸瘟疫之現狀〉，《遠東報》，1910年12月28日，第2版。

¹⁰¹ 〈申斥于道防疫不力〉，《遠東報》，1911年1月2日，第2版。

¹⁰² 外部來電，1910年12月30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4，甲374-46。

¹⁰³ 〈無心肝者豈宜爲小民之表率〉，《遠東報》，1911年1月19日，第1版。

又拂輿情」，於 11 月 29 日致電京滬，延聘出洋畢業醫士。¹⁰⁴12 月 10 日，東三省總督錫良指派具有西方醫學教育背景の日醫 1 名和華醫 2 名到哈。¹⁰⁵

這些醫生到哈後，發現問題頗多，提出了改良辦法，但防疫會陽奉陰違，並不按照辦理。此時華醫已經調查清楚傅家甸為肺鼠疫，經由人人傳播。但他們只有 2 名醫生，以及自己訓練的 5 名助手，不可能檢查每個病例，不得不依賴於地方未受過訓練的員警，將發現的病患送往防疫院，但並無隔離的安排。¹⁰⁶日醫到哈後，經過調查，亦發現了許多不合理之處，並提出改良辦法數條。¹⁰⁷濱江防疫會僅採納改造醫院一項，擇定商會隔壁寬大房舍，由日醫指點仿照日本醫院辦理。¹⁰⁸

防疫會未按照醫士提出的方法辦理，因此錫良派來中日醫士都不願在防疫會工作，於 17 日請辭回奉。¹⁰⁹經于道極力挽留，中日醫士留哈。但直到 12 月 21 日，他們以「房屋工程未完竣，機器、藥料未購齊」為由，一直未到所工作。¹¹⁰上級官府派來的具有防疫知識的醫士在長達 10 天的時間裡，被防疫會排擠在外。除了將病人送往鼠疫病院以及支付固定的棺材和安葬費用外，未採取其他的防疫措施。¹¹¹他們未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延誤了防疫時機。對此，《遠東報》感嘆道：「惟俄醫講求防疫一事，華人大不滿意，以為俄人防疫辦法不能施之於華人，故改用日本醫士及中國精通西醫者為之防疫。不意到哈不久，傅家甸又群起攻之，多謂日醫辦理防疫事宜過於嚴厲。」¹¹²

¹⁰⁴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0 年 11 月 29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7，甲 374-15。

¹⁰⁵ 飭于道電，1910 年 11 月 30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7，甲 374-15。華醫均畢業於採用現代醫學教育的北洋醫學堂，參見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5.

¹⁰⁶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7.

¹⁰⁷ 〈奉省派來醫官提出防疫辦法〉，《遠東報》，1910 年 12 月 11 日，第 2 版。

¹⁰⁸ 〈組織新醫院之情形〉，《遠東報》，1910 年 12 月 12 日，第 2 版。

¹⁰⁹ 〈日醫與華醫皆請回奉〉，《遠東報》，1910 年 12 月 17 日，第 2 版。

¹¹⁰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0 年 12 月 21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8，甲 374-15。

¹¹¹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5.

¹¹² 〈疫症關係之大如此〉，《遠東報》，1910 年 12 月 28 日，第 1 版。

與此同時，外務部得知俄使在外交團大肆議論防疫事，似有藉口干涉之意。¹¹³在此壓力之下，該部決定參與東北防疫事務，遴派天津軍醫學堂會辦伍連德暨天津衛生總局法醫梅聶，帶同衛生巡差 5 人，於 12 月 20 日起程，前往哈爾濱，會同籌辦防疫事務，其川資由外務部發給。¹¹⁴同日，應錫良之請，直隸總督陳夔龍派「深通西醫，確有經驗」醫官 3 員，醫學生 6 名，隨帶巡捕 20 名，到東三省幫辦防疫。¹¹⁵31 日，因哈疫盛醫少，錫良將他們全數派往哈辦理防疫。¹¹⁶此時，道外已聚集了奉醫、津醫以及英、法、日醫共 13 人，還有醫學生、巡差數十人。他們將在防疫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12 月 25 日，伍連德到達哈爾濱後，立即拜會了于駟興。此前錫良告知于駟興，應盡力籌撥伍連德諸醫到哈川資及購買藥物的經費。¹¹⁷此時，于駟興僅將伍視作普通醫生。他告訴伍連德，應先正式拜訪東清鐵路局的最高官員以及外國領事，訪問中國轄區和醫院，拜會傅家甸地方官和警察頭目，以獲得更多的資訊，再訪問俄國醫院並拜會俄國同事。最後，向他和北京中央政府提出建議。¹¹⁸

隨後，伍連德拜訪了其他官員。地方官和警察頭目堅持認為控制疾病的所有措施均已採用，僅願意考慮醫生提出的建議。¹¹⁹這些訪問使伍連德認識到，他不可能從地方官那裡得到任何的幫助。他們不過將其視作一般醫生，僅有調查和建議權而已。

¹¹³ 飭哈爾濱于道電，1910 年 12 月 22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8，甲 374-15。

¹¹⁴ 外部來電，1910 年 12 月 20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 13，甲 374-46。

¹¹⁵ 通致吉江兩省電，1910 年 12 月 20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8，甲 374-15。

¹¹⁶ 飭哈爾濱于道電，1910 年 12 月 31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8，甲 374-15。

¹¹⁷ 飭哈爾濱于道電，1910 年 12 月 22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8，甲 374-15。

¹¹⁸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5.

¹¹⁹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8.

伍連德到哈後，引起防疫會的不快，他們拒絕伍連德等人的指導，試圖獨自辦理防疫。他們認為奉天、北洋派來的醫生擬定的防疫辦法與商民習慣不同。用石炭薰洗染病的人，或用藥水灑掃染疫房屋，都是俄人防疫辦法，非常不方便。某日，有老人因戒煙腹瀉，消毒隊用藥水醫治不癒，引起市民恐慌。傅家甸自治會、商會以此為藉口，擬另行組織醫院，辦理商民防疫，「以免受現在醫院之嚴厲之法」。¹²⁰12月27日，濱江商會特邀紳商兩界聚集籌議增添醫院十數所，以便各區商民遇有病者送入醫院施治。病人食物由商會提供，但親屬不能隨便出入看視。病人住所則由醫士消毒。此外，紳商兩界推舉出16人，將傅家甸分為16段，每段以1人率領救急隊2人清查一切。¹²¹29日，該會租妥巡警第二分區分所附近房屋13間，擬重加修葺，開辦病院。¹²²實際上，該院醫士大都不知醫術，不解瘟疫的危險，惟知針灸而已，「用此等無教育、無意識之針醫，殊不知不傳染之害，至於胡底也」。¹²³對防疫會與伍連德等醫生之間的矛盾，于駟興僅表示希望西學醫生從權辦理，「不得操之過急，以致人民視為畏途」。¹²⁴

伍連德並不在意地方官和防疫會的抵制，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所在。伍連德是由外務部右丞施肇基推薦前往哈爾濱的。他得到了北京的強有力支持，可與施肇基電報直接聯繫，其背後則是外務部尚書那桐。¹²⁵來自北京最高層的特許權，幫助毫無地方經驗的伍連德，得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¹²⁶但真正做到這點，離不開東北地方官的鼎力支持。為此，外務部與東北地方官員就伍連德的職責，進行反覆交涉。

伍連德直接致電外務部指出，「傅家甸防疫諸事，統由不明衛生法術之人

¹²⁰ 〈公私醫院之並立〉，《遠東報》，1911年1月5日，第1版。

¹²¹ 〈濱江商會會議防疫事宜〉，《遠東報》，1910年12月27日，第2版。

¹²² 〈紳商自保會立病院租妥房屋〉，《遠東報》，1910年12月30日，第2版。

¹²³ 〈公私醫院之並立〉，《遠東報》，1911年1月5日，第1版。

¹²⁴ 〈道外另設醫院之原因〉，《遠東報》，1910年12月30日，第2版。

¹²⁵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9.

¹²⁶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10.

管理」，他不過只是擔任顧問，「於疫疾傳染無法管轄，疫症院由中醫經理，辦法更無成效」。¹²⁷外務部致電錫良，希望其飭令地方官對伍連德所辦各事盡情相助。¹²⁸錫良電令吉江兩省巡撫和西北路道切實整頓，對於紳商的阻擾，不妨嚴辦。¹²⁹此外，錫良特派譚兆梁前往傅家甸幫同于道切實整頓，並將原擬派往墨爾根、三姓兩處的醫生派往哈爾濱，協同辦理防疫。¹³⁰錫良還專電訓斥防疫會排斥官派醫生的做法，以及于駟興似是而非的態度，「防疫為各國要政，官派醫員生等實行檢驗，無非欲保全社會之安寧，允有病者必須受檢，且必須入院受治。訪聞該埠自治會多人開會演說，甚至明與官吏反對。該道不為懲辦，以致檢驗一事未盡實行，故傳染日多，疫勢日厲，轉令外人有所藉口，而該道仍此敷衍粉飾，實屬非是。」¹³¹

與此同時，伍連德在完成醫學試驗後，認為必須制定規劃，並據此成立簡單有效的防疫組織。他直接向施肇基報告：「1. 從臨床和細菌學已經確認了傅家甸是肺鼠疫；2. 該疫情是人人傳播，暫時排除了鼠類傳播，應集中控制人的活動與行為；3. 必須嚴格控制鐵路交通，中國政府需同俄國當局合作；4. 應組織巡邏隊控制道路和結冰河流的人流；5. 應命令傅家甸地方官修建更多的醫院容納病人，更多的隔離所容納疑似病人；6. 應從南方招集更多的醫生和助手；7. 地方道臺應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援；8. 應監視北京到滿洲的衛生狀況，若發生疫情，應採取強硬的防疫措施，包括建立防疫醫院和隔離所；9. 尋求日本南滿鐵路當局合作。」¹³²該項報告後來成為東北防疫的指導計畫，它

¹²⁷ 外部來電，1910年12月3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4，甲374-46。

¹²⁸ 外部來電，1910年12月3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4，甲374-46。

¹²⁹ 通致吉江兩省電，1910年12月3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8，甲374-15。

¹³⁰ 飭哈爾濱于道電，1910年12月3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8，甲374-15。

¹³¹ 飭哈爾濱于道電，1910年12月3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8，甲374-15。

¹³²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12.

打消之前外務部對伍連德的存疑，亦得到各國的認可。伍因此獲得來自外務部的全力支持，被提名為防疫總醫官。

12月31日，外務部致電錫良，指出「伍醫士明於醫理，一切應辦事宜，自應授以全權，並由地方官紳協力扶助」。¹³³當然，這也與西方日漸緊迫的外交壓力相關。西方各國不斷要求醫官在防疫事務上應有全權。駐京某使面告外務部官員，俄人擬藉口醫官因無全權，致使防疫辦法未能達到目的，煽動駐京外交團對清廷施加壓力。英國駐華大使亦致函外務部稱，「該館所派英醫報告，中國所辦防疫事宜已為完備，惟醫官須有全權，方可得有實效」。¹³⁴

東北地方官認為防疫並非單純的醫學事務，而是對外交涉的大事，應由地方官統籌辦理。伍連德到哈後不久，在與英、日、美領事會晤時，提出由中方先行派兵隔離。¹³⁵此事讓錫良大為緊張。1月2日，他一面電詢于駟興，為何伍連德逕向外務部請派部隊，一面電告外務部哈爾濱中俄雜處，派兵恐另生枝節，否定派兵之議。¹³⁶以此為契機，錫良提出應劃分醫官與地方官的權限。外務部派伍連德全權負責，但錫督認為「查驗、消毒事與民人有關，又兼對待外人」，必須與于道商辦，因此提議伍連德專主醫事，留診、查驗、消毒等事，由伍連德與于駟興隨時商明辦理。他請外務部命令伍連德為各醫定下職責範圍，確定在何處辦何事。¹³⁷7日，錫良再次致電外務部，指出「伍醫未知地方情形，動與東清公司枝節，或恐應付不周，反生枝節」，要求外務部飭令伍連

¹³³ 外部來電，1910年12月3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4，甲374-46。

¹³⁴ 外部來電，1911年1月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4，甲374-46。

¹³⁵ 此處所言調兵一事，係指「伍醫官電陳英、日、美領晤談情形，並云可否先由我自行派兵防阻」。外部來電，1911年1月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4，甲374-46。

¹³⁶ 飭哈爾濱于道電，1911年1月2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8，甲374-15。

¹³⁷ 致外部電，1911年1月3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4，甲374-46。

德，若遇應與俄人籌議之事，應先與地方官商明再辦。¹³⁸9日，外務部致電錫督，確認伍連德專辦防疫事宜，交涉事則仍由于駟興主持。¹³⁹至此，醫官與地方官在防疫事務中的權限有了明確劃分。

在錫良與外務部明晰醫官與地方官的防疫權限的同時，吉林巡撫陳昭常直接介入到防疫領導權之爭。他趕到哈爾濱，廢止防疫會，重組防疫機構，確認辦理防疫的醫生和官員的職責，落實錫良與外務部的商議結果。1月5日，因「伍醫不但全用西術，兼且不諳華言，內外溝通實多棘手」，¹⁴⁰吉林巡撫陳昭常乘坐東清鐵路火車，抵哈督察防疫事務。¹⁴¹陳昭常立即傳見各醫官，瞭解舊設防疫會的腐敗問題，及之前呼應不靈的狀況。¹⁴²

此時，防疫官員的各種醜聞見諸報端。于駟興派往傅家甸監察防疫事宜的翻譯員傅如臣，每日花天酒地，自作排遣，不過每晚從防疫所取一資訊報告給于道。¹⁴³防疫醫士則素有煙癖，常住在交涉局，與鴉片為緣，當問及防疫事宜，則答曰「傅家甸之危險盡人皆知，豈能來此犧牲性命，不過為之指點而已」。¹⁴⁴基於上述重重問題，于駟興成為防疫不力的代罪羔羊。東北督撫為免擔責任，屢次予以嚴責。吉林巡撫陳昭常到哈後，「謂于道辦理不善，致釀成此等惡果」。¹⁴⁵為警告辦理防疫各地方官，于駟興被革職，但因其諳熟地方交涉事務，必須依靠他辦事，故仍留為防疫局總辦。¹⁴⁶

經過幾日調查後，1月10日，陳昭常親到濱江防疫會，廢止該會，改立

¹³⁸ 致外部電，1911年1月7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4，甲374-46。

¹³⁹ 外部來電，1911年1月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往電〉，冊19，甲374-46。

¹⁴⁰ 陳簡帥來電，1911年1月22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⁴¹ 〈吉林巡撫到哈〉，《遠東報》，1911年1月6日，第2版。

¹⁴² 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1911年1月1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⁴³ 〈防疫醫員乃如此耶〉，《遠東報》，1911年1月4日，第2版。

¹⁴⁴ 〈防疫醫士亦如此耶〉，《遠東報》，1911年1月4日，第2版。

¹⁴⁵ 〈關道撤任之風說〉，《遠東報》，1911年1月10日，第2版。

¹⁴⁶ 〈于道撤革原因〉，《遠東報》，1911年1月23日，第2版。

防疫局。該局由于駟興擔任總辦，錫良派來的譚兆梁為坐辦，陳昭常的隨員宋革道和春鼇為會辦，伍連德為總醫官，濱江廳章紹洙為提調。于道、章丞是地方印官，在辦理買收不能消毒應行燒棄的民房和懲戒不服檢驗的人民時，可動用地方官的權力。譚兆梁曾在唐山協同辦理防疫，熟悉相關事務。宋革道熟悉哈爾濱情況，與紳商素有接洽，適合勸導商民配合防疫，避免官民與各醫因隔膜而起誤會。伍連德在防疫事務上被授以全權，統率各醫辦理。伍除了在公牘上與總、會辦會銜外，若遇地方官掣肘，可隨時直接呈報巡撫。至此，在吉林巡撫主持之下，道外防疫體系重建，官員與醫生各自有明確的名分和職權。他們的權限劃分如下，「醫官實授全權，署司等對於防疫事實只在參議，不能決議，有供應之職，無指揮之權」，每日防疫局各員會議一次，接洽並改良一切。¹⁴⁷

防疫局的組織看上去很完備，外務部派來的伍連德取得了防疫指揮權，但其他官員各有來頭，有東三省總督派來的譚道，有吉林巡撫帶來的宋道，還有革職留任的于道。¹⁴⁸他們各自為政，事權實難統一，伍連德實際上很難得到他們的全力配合。

防疫局成立之後，防疫官員仍表現疏忽。中俄雙方議定每週三開會一次，商籌防疫辦法。1月11日應召開第二次會議，俄員到會恭候，中方僅伍連德到會，而防疫局總辦于道和會辦譚道遲遲未到。雖屢用電話相催，但一小時後仍未見蹤影。輿論慨言：「夫今日疫症之甚，傅家甸每日必死百餘人，而譚觀察為專派來防疫之人，竟復如此優遊耶，吾人不知此輩惰夫是何處選來？譚道等前曾聲明願與俄員合辦，而今當傅家甸瘟疫日盛之時，竟不能到會，既失信於外人，又只欲犧牲華人生命，以固一己之差委。吾人不知究是何等心肝也。」¹⁴⁹對此，陳昭常於14日宣布，于道及譚道因延誤會議，致貽外人口實，記大過一

¹⁴⁷ 哈爾濱郭司使來電，1911年1月2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⁴⁸ 當時的報紙注意到這個問題，道出人事任命背後的玄機，「傅家甸防疫局兩副辦一為譚道，一為宋道。譚道由奉天派來專辦防疫者，而宋道由吉撫留哈辦理防疫者」。〈防疫人員豈得再生意見〉，《遠東報》，1911年1月18日，第2版。

¹⁴⁹ 〈防疫人員之心肝〉，《遠東報》，1911年1月14日，第1版。

次，以示懲罰。¹⁵⁰此外，《遠東報》登載了譚道疏於防疫的情形，「始終居住吉局之內，其往傅家甸時間甚為稀少，且與醫院醫士一次未往醫院研究」。¹⁵¹面對各方對譚道的指責，1月16日，錫督撤換譚兆梁，改派吉林交涉使郭宗熙星夜前往，負責「用人用款及一切佈置暨交涉事宜」。¹⁵²24日，錫良將譚兆梁撤差，飭令回奉。¹⁵³後因伍連德極力挽留，稱其辦事認真，與北洋各醫素有感情，實屬不可少之人，故而留哈照常辦理防疫事務。¹⁵⁴如此一來，譚道與于道一樣，雖因防疫疏忽被革職，但仍留任。

雖有上級的嚴厲督責，地方官員仍如此敷衍了事，其下屬亦難言盡職。吉、黑兩交涉局有疫死之人，但該局並未按照防疫規則檢查同居之人，及用藥水清潔房舍，反而極力掩飾。¹⁵⁵無怪時人感言：「此等官局人員更何能為小民之表率耶？無怪乎瘟疫日盛。」¹⁵⁶對此，不得不感嘆哈爾濱地方吏治之壞。這些懈怠的地方官，實際上無法為伍連德領導的防疫事務提供必要的支援。

五、防疫措施背後的政治支持

伍連德總醫官取得全權指導防疫的權力後，嚴格實施西法防疫。他指出，從臨床和細菌學上已經確認這是肺性鼠疫，幾乎完全是從人到人的傳播，因此控制鼠疫的努力，應集中在人的行為和習慣上。他要求阻斷傅家甸內外交通，

¹⁵⁰ 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1911年1月1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⁵¹ 〈無心肝者豈宜為小民之表率〉，《遠東報》，1911年1月19日，第1版。

¹⁵² 致陳簡帥電，1911年1月16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⁵³ 致陳簡帥電，1911年1月24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⁵⁴ 飭哈爾濱郭司使電，1911年1月2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⁵⁵ 「18日，報載吉林交涉局前有衛隊1名，因每日往來道裡道外，因之傳疫症而死。黑龍江交涉局內，日前亦有理髮匠一名病疫而死。兩局人員上下依然鎮靜，毫不以為怪，也不自行檢驗。」〈吉江兩局亦有疫症〉，《遠東報》，1911年1月18日，第2版。

¹⁵⁶ 〈無心肝者豈宜為小民之表率〉，《遠東報》，1911年1月19日，第1版。

嚴格控制甚至阻斷鐵路交通，分別隔離患病者、疑似病者和無病者。要做到這些，亟需各級政府的支持。若要阻斷交通，必須得到俄方的合作，才能斷絕與哈爾濱往來的鐵路交通，才能斷絕道裡道外的往來。若要隔離數以千計的直接接觸鼠疫患者的家屬、同事以及同居者，必須依靠員警及軍隊的幫助。對濱江關道來講，這些都在其能力範圍之外。因此，伍連德對防疫領導權的實現必須依賴於中央和督撫在經濟、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支持。

由於哈爾濱中俄分治的二元模式，如何應對俄方的防疫措施是地方官必須面對的問題。道裡採取嚴厲的防疫辦法，驅逐大量無業華人，地方官不得不緊急安置這批人。1月11日，道裡防疫局帶人到華人聚居的街道，每家僅留一人看門兼清理房舍，其餘全部送入莫斯科兵營查驗數日。據俄人統計，其界內隔離的華人甚多，「三十二所房內竟有華人3,800餘人，莫斯科兵營1,500餘人」。¹⁵⁷此事驚動到錫良，他聽說俄派兵在道裡搜索民人，逼勒至彼兵營做苦工。他認為這實在沒有人理，華民如不清潔或不遵章查驗，應當告訴中國官員督飭辦理，斷不能令安居無病之人空手於嚴寒之中遷徙，深受凍累之慘。12日，錫良致電在哈陳昭常，要求其查明情形，不容俄人橫行。¹⁵⁸

13日，陳昭常回電表示「尊處所聞，想係謠傳過甚」。道裡防疫會不過因近日疫勢日烈，決定嚴行檢查，以清其根源。防疫局派巡警到道裡按戶檢查，將所有貧民及火房、小店內居住的下等人約計千人，全部圈送到秦家崗火車內。¹⁵⁹鐵路交涉代辦達聶爾照會吉林交涉局，請其派員前往查視。于駟興派張兩三往莫斯科軍營照料一切。¹⁶⁰經交涉局派員察看，他們並未充做苦工，亦無虐待情形，不過留驗五日。俄方每日供給二餐，車內均生火堆，只不過不准自

¹⁵⁷ 〈防疫局之會議〉，《遠東報》，1911年1月12日，第2版；〈議事會之會議〉，《遠東報》，1911年1月12日，第2版。

¹⁵⁸ 致陳簡帥電，1911年1月12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⁵⁹ 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1911年1月13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⁶⁰ 〈派員照料華人〉，《遠東報》，1911年1月13日，第2版。

由出入。此後，交涉局每日派員前往察看。該電報顯示出，以陳昭常為代表的中國地方官員，已經接受西方防疫辦法，他們認為隔離、檢驗雖「中國人所罕見，歐美各國則已視為固然，舍此亦無除清之法」，並表示道外的防疫局正擬仿照辦理。¹⁶¹

就如何處置道裡無業華民的問題，東清鐵路公司與于駟興進行了會商。¹⁶²俄人決定，由華員查明有無職業，凡有本業者六日後一概放還，無職業之人一概運送出境。¹⁶³1月15日，交涉局前往道裡，連日會查俄人圈驗的1,700餘名華人有業無業。除有業者驗畢歸業外，其餘無業貧民502名，俄方決定送赴長春。¹⁶⁴16日，俄人告知中國官方，驗明無病的無業貧民，留哈必易傳染，為救死起見，要求中方於當日或次日速行送往他處安插。¹⁶⁵

此時的長春也是瘟疫肆虐，如何接納這些被逐無業貧民，成為中國官員面臨的難題。吉林巡撫陳昭常表示，「此項貧民到長，非設粥廠收留，斷難自活，而長春房屋不敷，陸續送往，萬難容納，且疫氣日甚。又恐多留一貧民，則多一傳染。」他提議與南滿、京奉鐵路公司商榷，將貧民轉送內地，以保全性命。¹⁶⁶因京奉、南滿火車先後於13、14日停運，無業貧民無法送入關內，此議只好作罷。

錫良與陳昭常商議在哈爾濱附近各府縣安置被逐貧民。如雙城有房屋可以棲身，即分別移送，日給口糧、煤火，妥為安置，「即多所糜費，亦不能惜」。

¹⁶¹ 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1911年1月13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9，甲374-15。

¹⁶² 〈防疫局之會議〉，《遠東報》，1911年1月12日，第2版；〈議事會之會議〉，《遠東報》，1911年1月12日，第2版。

¹⁶³ 〈拘去華人之將來〉，《遠東報》，1911年1月13日，第2版。

¹⁶⁴ 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1911年1月1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⁶⁵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1年1月16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⁶⁶ 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1911年1月1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他電告于道，就近飭知雙城金守照此辦理。¹⁶⁷于駟興回覆表示，將送往長春之人安置在雙城等處的辦法不錯，只是已經趕辦不及，俄人也不會答應，「窺其意在遞送東清鐵路以外，使之不易復回也」。¹⁶⁸此時，長春李道致電錫良，告知東清鐵路公司決定將圈驗無業貧民 500 餘人，於 17 日晚送赴長春。¹⁶⁹至此，就近安置的計畫亦告流產。

接到長春來電後，錫良只好接受俄人驅逐貧民的現實，命令長春李道速在附近村莊尋覓寬敞房屋，將被逐無疫貧民妥為安置，並酌給撫恤，毋令失所。¹⁷⁰吉林巡撫則命令李道，設法在附近州縣及蒙古等處地方，安插運來的無業貧民。¹⁷¹19 日下午，飽受隔離和遷徙之苦的哈爾濱無業貧民 500 餘人到達長春，被安插在附近村屯的店舖。為此，長春地方將商埠及城內外貧民遣往僻鄉安置。¹⁷²俄國驅逐華人的霸道行徑，地方官只能逆來順受，反映當時中俄關係的基本態勢。

其次，伍連德指出，鐵路是鼠疫傳播的重要途徑，斷絕交通為防疫第一要義。¹⁷³要做到這點，離不開地方官與東清鐵路公司以及道裡防疫局的交涉。鼠疫發生後，東清鐵路公司一直沒有停運火車，¹⁷⁴僅僅頒布華人乘坐火車的三條規定。¹⁷⁵1 月 7 日，中俄雙方商定，哈爾濱車站允許派華醫查驗，其他車站如

¹⁶⁷ 飭哈爾濱于道電，1911 年 1 月 16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⁶⁸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1 年 1 月 17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⁶⁹ 長春李道來電，1911 年 1 月 17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⁷⁰ 飭長春李道電，1911 年 1 月 17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⁷¹ 陳簡帥自長春來電，1911 年 1 月 19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⁷² 長春李道來電，1911 年 1 月 19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⁷³ 致外部電，1911 年 1 月 16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 14，甲 374-46。

¹⁷⁴ 這可能與俄國人對鼠疫的判斷有關。

¹⁷⁵ 具體內容包括：一、華人不准乘坐郵車、快車，除乘快車經過之華人、由鐵路總辦發給特別執

有查驗，也允派華醫辦理。¹⁷⁶

伍連德認為鼠疫是人人傳播，必須停運火車。為此，中方官員通過交涉，促使東清鐵路局停運火車。1月6日，奉天發現疑似鼠疫患者，引起高度重視。13日，京奉二三等客車停運。14日，南滿鐵道特發禁令，由長春車站開至雙廟子的三等車不售華人車票，頭二等車票須有特別執據，方准乘坐。¹⁷⁷在此背景下，錫良以「東清不停，將來長春必與哈埠無異，危險更甚」為由，電令吉林巡撫陳昭常交涉東清鐵路停運事宜。他認為俄國以文明國自居，不會不同意斷絕交通。¹⁷⁸錫良同時電請外務部與俄使交涉，將東清鐵路二三等客車即日一律停止。¹⁷⁹

14日，陳昭常率同于駟興以賀年為名到東清鐵路公司，與總辦霍爾瓦特商談，敦促其先確定暫停售賣二三等火車票。霍答應暫停賣三等票，二等車則採用留驗辦法。¹⁸⁰16日，外務部向駐京各使聲明，東清鐵路應停止二三等客車，並同俄使面商此事。¹⁸¹經過一再交涉，18日東清鐵路公司同意自20日起，一律停止售賣三四等票，二等車在哈留驗五日，無病方予准行。不過，車站檢驗所尚須兩三日方能開辦，屆時由中國官府派華醫會同查驗。¹⁸²

火車停運後，斷絕交通成爲一個重要議題。1月14日，在中方交涉停運

據者、中國稅關人員、交涉局人員、滿洲站由防疫會代表發給者，哈爾濱由交涉處發給者外；二、進入後貝加爾省的華人，須在滿洲里站調驗五日；三、華人只准乘坐東清鐵路的客貨車。〈鐵路公司防疫辦法〉，《遠東報》，1911年1月12日，第2版。

176 哈爾濱譚道、于道來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177 〈鐵道禁售華人四等車票〉，《遠東報》，1911年1月16日，第2版。

178 致陳簡帥電，1911年1月14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179 致外部電，1911年1月14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4，甲374-46。

180 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1911年1月14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181 致陳簡帥電，1911年1月17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182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1年1月18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火車時，俄方要求中方斷絕傅家甸交通，清查陸路往來各處的騾馬車輛，¹⁸³並要求不論有病無病，一律禁止往來。¹⁸⁴爲防止患病者從陸路南行，地方官在哈爾濱南行大道扼要地方設卡，兼派醫官查驗。¹⁸⁵外務部認爲東清火車停運後，徹底隔絕交通成爲防疫的重要內容，故致電錫良，請其注意。¹⁸⁶奉此，錫良電令吉、黑巡撫，必須嚴格限制驟增的長路騾車，隔絕交通，遏制鼠疫的蔓延。¹⁸⁷月底之際，地方官員認爲防疫當務之急在於斷絕交通，然後逐漸清查，「其疫氣最厲者爲之廓除，亦所不惜」。¹⁸⁸地方交通的斷絕則需要警兵方可辦到。爲此，東北地方官員從各地抽調巡警到哈協助。不敷應用後，錫良與陸軍部協商，從駐長春陸軍第三鎮抽調一千餘名軍人到哈，協助防疫。

伍連德到哈之初，就感到傅家甸巡警辦理防疫不得力。防疫隊僅有 100 名，加之居民不開通，必須借助武裝力量，才能有效防疫。¹⁸⁹他向外部提議，派軍隊到哈協助防疫，錫良以「該埠中俄雜處，兵多固恐另生枝節，齷齪且更不免有傳染之事」爲由，加以反對。吉林巡撫陳昭常則藉口，該省防軍正在各處剿匪，撥不出兵員來，更擔心忽增 500 名士兵，恐與俄兵起衝突，後患不堪設想，否定調兵之請。¹⁹⁰

爲滿足伍連德要求，地方官員一面從外地調撥巡警到哈協助防疫，一面在

¹⁸³ 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1911 年 1 月 14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⁸⁴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1 年 1 月 14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⁸⁵ 致陳簡帥電，1911 年 1 月 14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⁸⁶ 外部來電，1911 年 1 月 24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 15，甲 374-46。

¹⁸⁷ 通致吉江兩省電，1911 年 1 月 25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⁸⁸ 飭哈爾濱郭司使電，1911 年 1 月 26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¹⁸⁹ 〈派兵五百之由來〉，《遠東報》，1911 年 1 月 10 日，第 2 版。〈巡警局支區添招警兵三十名〉，《遠東報》，1911 年 1 月 6 日，第 2 版。

¹⁹⁰ 致外部電，1911 年 1 月 3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 14，甲 374-46。

傅家甸設法招募防疫巡警。1月7日，于駟興飭令雙城府派巡警200名到哈，並預備100名候調。¹⁹¹10日和14日，雙城巡警各到哈100名。後來，因鼠疫蔓延各處，續到巡警僅新城的100名，遠遠不敷應用。¹⁹²到哈的巡警也難逃傳染，到24日，「被傳染二十餘人，已死其一，兵眾皆懷去志」。¹⁹³

調撥和招募的巡警遠遠不敷隔離的要求。1月15日，伍連德電告吉林巡撫，「現調來各處巡警三百五十名外，尚需千人始敷分佈」，請求派兵協助防疫。當時，鼠疫已沿鐵路線蔓延開來，吉林省各處皆須辦防疫，且各防吃緊，無兵可調，故吉林巡撫請錫良諮商陸軍部，電飭駐長春陸軍第三鎮曹錕選兵1,000名，「擇定稍明衛生，通曉事理之隊官多名，預備來哈」。¹⁹⁴18日，陸軍部致電錫良，告知如果辦理防疫事務須軍隊襄理，可以臨時遣派曹錕陸軍第三鎮，該鎮已有部電訓條。¹⁹⁵

19日，錫良致電駐長陸軍第三鎮曹錕，道明「吉省防、陸各軍程度較低，哈埠為通商要區，防查不力，深恐外人干涉，尤關國權」，請其克服困難，速酌派數百名馳往襄理。¹⁹⁶當時，駐紮在吉林的軍隊數量非常有限，只有第三鎮12,512名和吉林第一協4,036名。¹⁹⁷加之各地匪警迭報，紛紛請援，原有吉軍不敷派遣，駐省步營由孟統制、高統領攜帶出外，以致就近軍隊實無一兵一卒可撥，困難萬狀。¹⁹⁸曹錕的陸軍第三鎮，除分紮昌圖一協、吉省一標外，駐長

¹⁹¹ 哈爾濱于道來電，1911年1月7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⁹² 哈爾濱郭司使來電，1911年1月26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⁹³ 雙城金守來電，1911年1月24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⁹⁴ 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1911年1月1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⁹⁵ 陸軍部來電，1911年1月18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15，甲374-46。

¹⁹⁶ 致長春曹統制電，1911年1月19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¹⁹⁷ 〈東三省總督錫良存官制改革等條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甲374-174。

¹⁹⁸ 陳簡帥來電，1911年1月22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步隊只有一標，而且退伍人數甚多，實難派兵 1,000 名赴哈。¹⁹⁹錫良請曹錕無論如何酌派數百名前往襄理，不敷之數由陳昭常酌調吉省軍隊赴哈襄助。²⁰⁰20 日，陳昭常派李參議赴長春與曹錕接洽商辦。按例督撫可調遣紮東省軍隊，但必須由東三省督練處命令該鎮，方可調兵。陳昭常請東三省總督錫良電飭曹錕，即日調兵赴哈，並電達陸軍部，請其速飭遵調。²⁰¹同日，錫督致電曹錕，要求其電覆「所派兵數若干、何日開拔？」。²⁰²21 日，曹錕回電，指出哈埠于道來電告知哈爾濱房屋尚未備齊，等其電告再行啓程。²⁰³22 日，陳昭常擬請曹錕無論如何至少派兵 500 名，星夜赴哈，其餘 500 名，由駐省十九標調撥前往。²⁰⁴此時，陸軍部電令曹錕與東三省總督協商防疫需兵事宜，並告知錫良可逕電曹錕遵照執行調撥命令。²⁰⁵此時，該鎮已挑選精壯步兵 360 人，連同官佐夫役共計 400 員，準備好糧餉、服裝和藥品，等待火車預備妥當，即行開拔。²⁰⁶

此時，因俄使要脅干涉，外務部要求速派步兵前往哈埠。22 日，外務部致電錫督，告知各國通行的防疫辦法，必須派兵圍守發疫地方，不准居民外出，要求速派步兵前往哈埠，滿足防疫所需千人。除已準備好的 400 人外，其餘 600 人由該鎮續派，或在長春步標內續選 600 人。²⁰⁷

¹⁹⁹ 致陳簡帥電，1911 年 1 月 19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⁰⁰ 致陳簡帥電，1911 年 1 月 20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⁰¹ 陳簡帥來電，1911 年 1 月 20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⁰² 飭長春曹統制電，1911 年 1 月 20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⁰³ 長春曹統制來電，1911 年 1 月 21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⁰⁴ 陳簡帥來電，1911 年 1 月 22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⁰⁵ 陸軍部來電，1911 年 1 月 22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 15，甲 374-46。

²⁰⁶ 長春曹統制來電，1911 年 1 月 22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⁰⁷ 飭長春曹統制電，1911 年 1 月 22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22 日，于駟興電告曹錕，租到可住 400 人的火磨空房，並請其隨帶 7 日糧食。23 日，曹錕致電郭宗熙，請其與東清鐵道訂定火車，以便開拔。²⁰⁸25 日，錫良電令郭宗熙，速與東清鐵路訂定火車，將所派千人合為一批，載運赴哈，並覓定住處。²⁰⁹26 日，錫督致電郭，指出「外人以我派兵延緩，急圖干涉，萬一俄兵赴傅家甸圍守，必至滋釀事端」，要求該道速與東清鐵路公司商定，派車赴長迎載，並趕緊為守候開拔哈埠的第三鎮駐長營隊 1,000 名官兵做好準備，賃好兵房，如房舍無多，趕速添備。²¹⁰此外，哈爾濱地方為該鎮官兵備好大皮襖千件，以禦嚴寒。²¹¹25 日，郭宗熙為陸軍千人覓得房屋，勉可敷住，並商定東清火車開赴長春三等車 1 輛，四等車 13 輛。²¹²27、28 兩日，第三鎮的千名官兵乘車起程赴哈。²¹³

從 15 日到 28 日，清政府內部經過反反覆覆地交涉，伍連德防疫所需的 1,000 名士兵終於抵達傅家甸，參與隔離疫區和阻斷交通。此中調兵之難，反映清廷對軍隊的命令已很難做到令出即行。

最後，哈爾濱防疫得到朝廷的有力財政支持。早在 12 月 17 日，錫良致電度支部，告知防疫不僅事關民命，而且有關保衛主權，必須認真籌辦。防疫的各項開支包括派醫、購藥及分別設所，需款甚巨，請求該部命令各處陸續籌墊。²¹⁴度支部准防疫費做正開銷，先行分諮，俟事竣核實報銷。²¹⁵

²⁰⁸ 長春曹統制來電，1911 年 1 月 24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⁰⁹ 飭長春曹統制電，1911 年 1 月 25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¹⁰ 飭哈爾濱郭司使電，1911 年 1 月 25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¹¹ 飭長春曹統制電，1911 年 1 月 26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¹² 哈爾濱郭司使來電，1911 年 1 月 25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 19，甲 374-15。

²¹³ 致軍諮處、外部、陸軍部電，1911 年 1 月 29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 15，甲 374-46。

²¹⁴ 致度支部電，1910 年 12 月 17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京師來電〉，冊 13，甲 374-46。

²¹⁵ 通致吉江兩省電，1910 年 12 月 23 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

1月12日，防疫經費由稅關項下暫撥40,000元，一面諮行稅務司照辦，由稅關如數撥給，以應防疫急需。²¹⁶13日，郭司使、于道電告錫督哈埠辦防疫而兼賑，事情複雜，用款浩繁，除預約各款外，又增加陸軍津貼和各城調哈巡警薪餉，²¹⁷為篷車內圈驗約一千六、七百貧民購備米、麵、火柴、棉衣等費，以及斷絕交通後無業傳家甸苦工所需酌給口糧和火柴費。²¹⁸25日，哈埠防疫經費已在綏、滿兩關第二百零一結稅款內提用5萬，濱江關存款項下提用8萬。²¹⁹

從某種程度而言，伍連德在防疫事務中取得的領導權是一種指導權，防疫具體事務的展開，必須依賴於清政府政治體系的運作。若離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在政治、外交、軍事和財政上的支持，防疫很難切實執行。這種傾舉國之力勉強而為的防疫，極大地考驗著清王朝的社會管理能力。

結 論

東北鼠疫爆發之初，中央政府、地方官府、地方紳商和俄國勢力圍繞哈爾濱防疫領導權，展開角力。伍連德總醫官對防疫事務的領導地位，從一紙公文到真正實現，正是上述各方政治勢力的鬥爭和妥協的結果，其深層的原因則是中西醫學之爭、中俄主權之爭和中央與地方之爭。

鼠疫初現之時，僅僅是一件由地方處理的突發事件，但由於特殊的空間和迥異的文化，防疫並非簡單的醫學事務，而是事關交涉大局。哈爾濱地理位置特殊，存在著中俄共治的二元管理體制。中俄雙方在此長期處於一種對峙並存狀態，中方對於俄方可能的干涉特別敏感，擔心俄人藉口謀取中國土地，侵犯

電》，冊19，甲374-15。

²¹⁶ 〈撥防疫經費四萬元〉，《遠東報》，1911年1月13日，第2版。

²¹⁷ 此項薪餉始議由各城自發，哈局只給津貼和店食，後改全由哈發放。

²¹⁸ 哈爾濱郭司使、于道來電，1911年2月1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²¹⁹ 哈爾濱郭司使、于道來電，1911年1月25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吉林來往電〉，冊19，甲374-15。

中國的主權，總是儘可能予以抵制，避免俄人干涉。這種心態在防疫事務中體現得特別明顯。俄方對防疫非常重視，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勢，甚至以出兵相威脅。面對俄人的防疫要求，地方官紳採取合作態度，表面接受俄人做法，形式上設立與道裡一樣的機構，實際上拒絕採取俄方粗暴的防疫措施。這種表面敷衍、實際拒絕的權宜之計，引起俄人的反感，防疫合作中斷，道外疫情亦因此未能及時控制，導致局勢惡化。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體現了中國人應對中俄交涉時的一種政治智慧。在不平等的中俄關係中，中方在外交、軍事、經濟和地方管理上，無一不處於弱勢，處處受其逼迫。俄方通過外交手段迫使中方必須接受其要求，建立西式防疫體制。在此背景下，哈爾濱地方官紳從維護主權、抵制干涉的角度，對防疫做政治化解讀，拒絕一切西式防疫辦法，拒絕俄醫的參與。他們抵制了俄國人的干預，為後來伍連德獨立領導防疫事務奠基。

除了對主權的擔憂之外，道外抵制俄人插手防疫的重要原因，在於中西不同的防疫理念。如前所述，中醫認為鼠疫是可以醫治的，或服藥，或針灸，無需採取強制性措施，即可起到防疫的作用。俄方則認為無法醫治，必須採取積極措施，通過隔離、消毒、檢疫等手段，將疫情控制在特定範圍內。中國社會各界對這些措施非常反感，更由於俄人對華人的粗暴行為，使得各種謠傳甚多，官府和俄人均不得不及時闢謠，以免引起社會動盪。

道外華人雖然為維護主權，固守獨立辦理防疫的領導權，卻未能抑制疫情的蔓延，更未能阻止外國駐華使團對外務部施加壓力。哈爾濱鐵路交通便利，可直達北京和莫斯科，使得鼠疫流行的範圍具有很大的延展性，自然受到來自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俄國人在實在無法干預道外防疫的狀況下，只好同中央外務部交涉，要求嚴格防疫。在清末政治運作中，事關外人，必然為清政府高度重視，外務部可直接干預地方事務。但是，外務部對地方事務的干預，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所能達成的。文中展示了清外務部在以俄國為首的外交威脅下，深怕升級為外交事件，一再施壓地方官府，要求採用西法防疫。除了一再嚴令

外，外務部亦無他法，只有得到地方配合，才能落實其命令。東北地方對外部的命令採取敷衍的態度。清政府在哈爾濱設治很晚，加之哈爾濱作為新興的商貿城市，官署實力有限，難有作為。他們必須依靠紳商勢力，才能履行社會管理的職能。地方官並不能控制紳商把持的防疫會，來自中央的命令只是一紙空文，派來的醫官也只能置身防疫事務之外，無所事事。直到疫情蔓延，一發不可收拾，俄人威脅動兵之時，吉林巡撫親自到哈，廢除防疫會，將防疫機構收歸官辦，才按照外國使團的要求，辦理防疫事務。

外務部派伍連德為防疫總醫官，指導哈爾濱的防疫事務，進而負責整個東北的防疫。但其獲得防疫領導權，並非來自外務部一紙公文，而是中央和地方政治鬥爭的結果。外務部授予醫官全權領導防疫，受到東北地方的抵制。在地方官看來，醫官地位低下，不過是為他們提供服務的人員，不願聽從醫官的指導。直到吉林巡撫到哈後，重新分配防疫職責，醫官才取得指導防疫的權力。因事涉外交，僅僅將指導防疫的權力交給醫官，其餘權力仍歸地方官吏所有。東北政治體系圍繞他提出的方法，安置俄人驅逐的貧民，協商停運火車以及調兵阻斷交通等等。若離開政治運作的配合，伍連德防疫指導權亦難得到執行，僅會停留在紙面而已。

由於資料的侷限，以及筆者自身的主觀意識，文章或許不能準確地描述哈爾濱防疫領導權爭執的複雜過程。也許只能說，透過朝廷官員、伍連德和俄國報刊的目光，部份看到了一個世紀前發生的故事。謹盼文章略顯繁密的講述，能增益我們對歷史的感知。

Leadership Stuggles over Epidemic Preventive in Harbin, 1910-1911

Du Lihong^{*}

Abstract

In November 1910, when the bubonic plague appeared in Harbi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local authorities agreed to fight the epidemic together. Before long, however, their cooperation was broken due t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epidemic. The Russians tried to intervene in epidemic prevention in the Chinese district of Daowai. The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and elites completely refused Russia's demands. After negotiations, Russians and Chinese decided to isolate Daoli, the Russian district, from Daowai. When the epidemic continued to spread rapidly and the situation worsened, the Qing dynasty faced ever-greater diplomatic pressure, which forced the Foreign Ministry to send Wu Lien-Teh and other Western-educated doctors to Harbin to supervise epidemic prevention. At first, they were treated as outsiders by local officials and elit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the medical directive powers of the doctors had been recognized by the local officials in the Manchurian regions through long negotiations with the Foreign Ministry, while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Harbin still presided over diplomatic affairs. Thereafter, the Western Epidemic Preventive Policy set down by Wu was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o that plague prevention policies were carried out smoothly. In sum, the dispute over the leadership of epidemic preventive in Harbin was a complicated process beset by numerous tensions. It cannot be simply summarized as a struggle over sovereignty, nor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or yet as the result of diplomatic pressure.

Keywords: Harbin, epidemic preventive leadership, Wu Lien-Teh, Sino-Russian diplomay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